

理想常常让我充满期待

——壮族诗人费城访谈录

□ 林均娇

【作家简介】



费城,本名韦联成,1984年生于桂西北,现居河池大化。系中国作协会员,鲁迅文学院37届高研班学员,广西现当代文学艺术创作文学桂军“出名家出名作”主创团队成员。有作品发表于《民族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等刊物。著有诗集《往事书》,曾获第五届广西少数民族文艺创作“花山奖”、广西年度诗人奖等。

林均娇:您的人生经历比较复杂,似乎好久没有您的消息,请问您现在在哪里工作呢?

费城:我现在在大化瑶族自治县工作。我待过很多的地方,也在很多单位工作过,算是比较漂泊吧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,那会是因为跟随父亲工作的变动而漂泊各地。后来,长大了,外出求学,然后在各地工作,一直延续这种身体上的漂泊。最重要的一点,则是心灵的“漂泊”,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感,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游荡。漂泊感在我的心头是一种比较孤独和阴郁的色彩,这也体现在我的很多作品当中。

林均娇:所以您从事诗歌写作多年,其实就是在寄托心灵的“漂泊”,用自己的方式在漂泊的生活里保存您的温暖,至今为止这样的想法是否改变过?

费城:从前,我认为写作在我生命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,而现在觉得写作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。因为,写作之前还需要大量的阅读,这就需要有大块的时间才能实现。现在我工作事务繁杂,心态也完全变了,很难有这样的状态和时间,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安静下来,保持一种相对宽松的思考和写作状态,这样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作品的创作。所以,我常常有停止写作的想法。漂泊,也许只是个人处境的一种暂时状态。但久而久之,也许就成为一种“习惯”。哪怕是现在有着固定的居所和固定的工作,但心灵依然是一种“悬浮”状态,这对于我可能是一种精神的“枷锁”。

林均娇:既然有停止的想法,又是什么动力让你坚持下来?

费城:写作于我,也许就是给自己的灵魂,找寻一个理想的“居所”吧。但现实与理想往往背道而驰,甚至相去甚远。但是,正因如此,我们还有追索“理想”的诉求,才能保持一份对未知事物、前途、未来的遐想。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“精神生活”。人活着,总要思考一点什么,才能保持一份对未知事物的想法和期待,才能始终保持一份内心的“鲜活”,而让自己不至于在平庸的生活中逐渐失去对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。

林均娇:何不言在《为了确认痛感,我们写诗——读费城的诗》一文中提到,年纪稍大,就容易产生虚无感,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诗坛保持距离,您有没有这样的想法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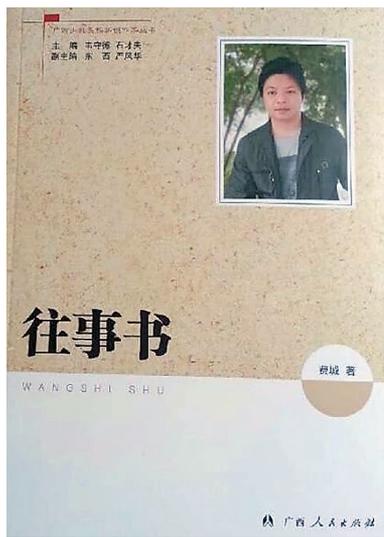
费城:确实如此。说实话,文学并不能给现实生活带来多少实惠,许多时候可能还会对你的现实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。但并不会因为这

样,就让一个热爱文学二十年的人轻易放弃写作。也许,一个写作者即使很多年没有再写一个作品,但内心里对文学还是有情怀的。我常常觉得,一个写作者与文字的相遇,并非“偶然”。那一定是“命中注定”的机缘,在一个人的情感里,先天就埋藏着文学的“种子”,始终会在某个不确定的时机“破土而出”,萌发出“新芽”。

林均娇:都说壮族歌圩以歌会友,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,您觉得壮族的身分是否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?

费城:可能会有一定影响,但我不确定。其实,我不会说壮话,从小也不是在故乡长大的。我从小生活在矿山,那里聚集着来自广西各地的人们,他们说着各种方言,对我的口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但后来,我随同父母回到故乡生活,那个名副其实的壮族村庄,壮话是当地的通行语言。因为不会说壮话,我在与亲人的交流中会产生隔阂感。可以说,壮族身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曾给我带来了许多烦恼和困扰,也间接对我的内心和情感产生影响,也就是说,在语言隔阂的环境中成长,使我更加孤独。这也间接促成了我对文字的敏感,让我试图从文学中寻找一些自我安慰吧。

林均娇:您觉得这样的创作初衷与您的民族身份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?



▲费城诗集《往事书》。

费城:我是壮族人,也在壮族地区长大,无论从生活环境还是生活习惯多少都会有一定影响。但是,我虽然是壮族人,却不会说壮话。这从情感上来说,还是有一些隔阂的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,导致了我后天性格和情感的养成,这直接反映到写作上,在处理与故乡有关的一些作品题材时,总是以一种既模糊又复杂、纠结的状态呈现。这是一种不具象,且模棱两可的表达,在文体的把握上就很难说得分明。这也是我一直以来,习惯用诗歌这种体裁进行写作和表达的原因之一,这利于我在写作过程中可进行适度的隐藏和剪裁,留下更多空白。

林均娇:张桂林教授曾在《文化记忆与现实关怀》一文中表示,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写作中有一个共同倾向,即他们生活在一个面临同样问题的世界中,这些问题与民族身份无关,而与现代性的来临、社会转型有关。对此您怎么看?

费城:我非常认同,他说得非常准确。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,我从小成长在农村,对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,比如城镇化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阵痛,裹挟着我们的情感,一方面让我们切身感受着乡村生活的远去,一方面童年生活对我们的影响根深蒂固,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强行闯入的时候,我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,内心时刻面临一种不安和焦虑。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长大,没有过渡,疾驰的时代列车便从眼前呼啸而过,让我们一时没能缓过神来,便已经长大成人。

林均娇:您在诗集《往事书》的自序中提到刚开始写作也不知道诗歌是什么样的体裁,只是隐约觉得分行的文字更容易贴近您的内心。您现在的主要创作理念是什么?

费城:创作理念可能还谈不上,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创作理念,可能说表达方式或表达习惯更准确一些,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凭着感觉在写一些东西,一种内心感受到的事物,通过具象或不具象文字的表达,把自己内心、情感里的一些“症结”呈现出来。然而,这样的呈现,可能是隐蔽的,或者明朗的。我不期待所有人都能完全读懂,甚至有些作品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,只是意识里游移着这么一种情感,但是这种情感有时是漫长而持久的,有时却又很短暂,就好像脑海中忽然闪现的一幅画面、一个场景,一瞬间让你有所顿悟。像一个火花的闪现,这并非瞬间的灵感闪现,而是情感中某一个隐秘的触角被不经意激活了。我的写作一直以来都是凭着感觉去写,如果哪天没了感觉,或者失去了这种感知事物的能力,也许我也就不再写作了。

林均娇:在您的《往事书》中,您的好友朱东生表示,希望您在诗歌路上执著前行的同时,也要慎重地处理感性与理性、现实与理想的关系,要多关注现实生活的点滴,对此您有什么看法?

费城:一个人过于理性,就容易变得世故,会很没趣。有理想的人,通常可爱,我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态度,感性一些,更容易亲近自然,更能感知事物的美好,也就更热爱生活。同时,现

实与理想也并不矛盾,一个积极、向上的心态,更容易理解和体谅生活。现实生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,我们还有精神生活需要关照。每个人的生活环境、人生际遇都有所不同,有些人更注重物质生活,有些人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。其实,文学的另一个好处,就是通过冥思和自省,从而更了解我们自己和了解我们的情感,才能感知我们的精神世界可能存在的某个缺口。这也是文学之所以能够慰藉我们的心灵,让我们能够活得更清醒、更明白,更了解自己的原因。医生没法给人们心灵的隐患开具药方,但是文学可以做到。有些精神、情感上的问题,我们可以通过文学、艺术、电影等方式找到答案。

林均娇:有研究者发现,您的诗歌作品常常沉浸在故乡的情结当中,乡愁是您的基本命题,即使在城市居住多年,仍然以记忆中的故乡来写作,您觉得这样的说法合理吗?

费城:我的很多作品确实都是写故乡和写乡村的,这是我写作的局限。甚至,作品中的故乡,也常常是虚构的,这是我个人理想化的故乡。其实,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并不长。现实中的故乡,留给我的记忆非常有限,也不尽美好,但是我却有着浓重的故乡情结,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

林均娇:曾有文章指出,21世纪以来广西80后、90后青年诗人发展,以“群体”形式的“亮相”与发声次数相对有限,但以个体形式的创作发表与被刊物关注次数则相当可观。对于作家的群体形式与个体形式的发展方式,您是怎么看的?

费城:广西80后这一拨诗人当中,我算是写作相对比较早的,回头想想,差不多有20年了。很可惜当年很多优秀的写作者现在都已放弃写作,并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。也许80后都已不再年轻,或许有人因为生活所累,放弃了写作。80后诗人队伍越发式微,这确实是现实的状况,我期盼终有一日,他们能够重新归来。当然,广西90后、00后诗人中不乏优秀者,只是当下环境,令人很难把诗歌写作当成一种人生追求。关于“群体”的话题,我认为意义不大。个人觉得写作无需抱团取暖,可能独立思考、独立写作更能彰显个人风格。

林均娇:在您的诗歌作品《思想的石头》中写了各种面貌的石头,这些石头是不是承载着您对内心或者灵魂的表达?

费城:其实那是一首写人的诗,以石头比喻故乡的亲人,他们孤傲、坚韧、贫穷,像我的父辈一样,有着石头一般的面孔、石头一般的品格,同时也像石头一般承载着苦难的命运。我像一只咯血的鹰,站立在山头,见证他们背负深重的苦难,饱含着怜悯。

林均娇:对于新生代诗歌创作者来说,遇到一位创作上灵魂契合的良师尤为重要,对此,您对年轻一代诗歌创作者有什么建议吗?

费城:启蒙固然很重要,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很重要。但最重要的是,要读懂自己的情感,通过文学找到化解自己内心不安的办法。



▲身穿壮族服饰的费城(左二)在北京参加鲁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。(本版图片由费城提供)